

# 信息与分析

(总第 262 期)

第 7 期

西南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 本期要目

|                     |   |
|---------------------|---|
| 超越卓越的创新 .....       | 1 |
| “学术大牛”是如何养成的 .....  | 4 |
|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宜早不宜迟 ..... | 8 |
| “双一流” 需要一流管理 .....  | 9 |

## ※ 超越卓越的创新 ※

☞ 编者按：大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学习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经典，历久而弥新的命题。复旦大学教务处徐雷处长对于怎样更好地提升能力和素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学习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经典，历久而弥新的命题。一般都会认同：他们学的是知识、能力和素养。但怎样才能更好地提升能力和素养？则是现代大学的长久追问。

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校长亚当·福尔克认为，教育从根本上来讲是一次人为活动，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越直接越清晰越好。而美国教育家威廉·亚瑟·沃德有一段名言，则为这种大学所独有的师生互动，提供了很好的注解。原文大意是：经师言教，人师身教，良师开释，大师开悟。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即使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高校，我们还没有做到普遍深入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动”，我们的培养模式仍然部分停留在“言教”和“开释”，我们少有“身教”，更缺“开悟”。虽然做好“言教”和“开释”已属不易，但要实现高等教育创新使命，后者则必然是一个时不我待的中国教育命题。

2014年春天，复旦大学部分“著政学者”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探访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在场的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认为，“著政项目”是李政道先生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秉承着启发本科生的创新精神，深度探索并引领高校本科生应如何系统地参加学术研究与训练。

但我们要不断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学生在科创中的卓越？学术参与规范和兴趣维持之间如何平衡？论文的多寡与研究品质之间何以权衡？在“曦源—望道—著政—登辉”这一“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以下简称FDUROP）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中，如何形成复旦大学对创新性人才的逐步提升的阶梯性？这是“著政望道”项目操作过程的关键。

#### 第一个层面 不以论文发表论英雄

2013年，我参加“著政学者”赴台交流回来后的答辩，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哲学院国学班学生林振岳，他研究的是非常枯燥的课题，但绝对是个“终结者”——在为某个学者做编年史。他当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他在答辩中表现出来的沉稳，以及沉浸在研究中的满足状态，我们至今都记得清楚。

林振岳参加的是“望道项目”，理论上没有机会参加“著政项目”的活动，但教务处特别推荐他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著政项目”暑期赴台学术交流活动。他本科毕业后读了研究生，拿到了研究生“大奖中的大奖”——相辉奖。

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恽敬集》的编辑在获奖后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感谢了两个人：一是这本古籍的主要整理者著名学者万陆先生，另一个就是林振岳。该编辑来复旦大学查古籍资料时，碰巧是林振岳值班，但他显然不仅仅是个“搬书工”，他找出了某个篇章不同年代的五个版本，以及三个校本，而有些版本在各图书馆网上目录均未登记。

正是由于他的史料收集，使《恽敬集》从原先的简单校点，变成汇校、汇评，学术价值获得大幅度提升。如此这本原来与林振岳没有任何关系的书，最后署名为“万陆、谢珊珊、林振岳标校，林振岳集评”。林振岳成为除万陆先生外最重要的作者。

在整个项目实施的 18 年里，有不少这样的“林振岳”，他们各有各的坚持兴趣的方式和方法。一个人最终成功，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情商与智商，而是毅力。如果学生能从“砮政”“望道”等项目中感悟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快乐，愿意更投入地进行问题思考，我们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才是李政道和秦惠蓉夫妇设立项目的初衷。

### 第二个层面 三年学徒生涯求规范

我同样不知道有多少本科生，是经历过所谓的“三年学徒”生涯的。我遇到希望来我的课题组里做研究的学生，通常会问：“你们是愿意自己做一个题目，还是跟研究生们一起做？”他们的答案大都是希望自己做。这当然很好，但如何接触正规的学术训练？这是本科生培养中遇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学术价值取向。虽然不排除不符合现代规范的想法会有一些创新性的发现，但现代科学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家庭实验室阶段，更多的是团队合作和更加严格的学术规范。

本科学术很可能是大学生真正接触正规学术的第一步，第一步一定要走“正”。这和发表论文的多与少构成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原创思考如果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可能会“不了了之”。同时，没有合理规范的学术项目操作，最后也会为学生带来不好影响，他们会认为“学术就是这么回事”。学术诚信是学术生涯的基石。

复旦大学在推动学生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砮政望道”这一高层面的本科生科创项目评审中，一旦发现不诚信现象，负责项目的办公室可以随时终止哪怕已经进入“终期答辩”的项目。当然，我们在项目设计中采取了真正灵活创新的环节：学生出国留学，项目可以带着走，什么时候完成了，什么时候回来答辩。不让刻板的制度“框死”研究兴趣，引导学生有耐心地遵循学术规律和研究规范。

### 第三个层面 “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约翰·霍普克拉夫谈到如何鉴别真才实学时说：“这很简单，只要选三位相同专业方向的优秀科学家，问学生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如果听说过，那么第二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如果读过这个人的文章，那么第三个问题，这个人的论文有什么学术贡献？

此中可以看出，论文的多少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本科生做学术，要理解和遵循的是“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这是超越“卓越”的内涵所在。

除了本身的学术功力外，也需要“宣传自己”。比如，与国际的学术圈子互动，尤其是在重要的国际专业会议上作一个精彩的报告，可能会获得很多“真知灼见”的反馈，而这也是学术问题和科研进展获得承认的重要环节之一。

最后，“超越卓越-回归创新”的项目坚持。前不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韩福国老师参加完“茗政”“望道”项目的中期答辩后发现：大多数学生仅仅停留在对文献和数据做出一个基本的梳理和解释，并未表现出对学术问题的钻研精神，以及对学术问题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是未来‘茗政’‘望道’的发展及项目审批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始终相信，一个人最终能达到的高度，与其品质追求相关。而品质的提升，来自不断与大师以及志趣相投的优秀群体的交流互动，不断挑战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教育报》，2016年07月11日，第6版。）

## ※ “学术大牛”是如何养成的 ※

编者按：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却保持了一种异于大部分的人生步调，或一门深入，获取思想的深度；或勇敢冲锋，攀登科技的高峰。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却保持了一种异于大部分的人生步调，或一门深入，获取思想的深度；或勇敢冲锋，攀登科技的高峰——“学术大牛”是如何养成的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面带青涩的毕业生走在人生岔路口。其中大部分人在干完校长们精心熬制的最后一碗“鸡汤”后，走向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打拼。但也有一些人会选择继续坚守“象牙塔”，立志摘取塔尖的珍珠与桂冠。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那些潜心学术的大学生们。在有些浮躁的世风里，他们保持了一种异于大部分的人生步调。他们或者一门深入，获取思想的深度；或者勇敢冲锋，攀登科技的高峰。别人眼中的“学术大牛”是如何养成的？而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选择了学术道路？

科研就像谈恋爱，需要热爱和责任

“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坚持下来了而已。”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张哲野博士如是说。淡定的表情，与他有些惊世骇俗的成绩不太相称——这个 90 后大男孩本科期间，就跟一帮子博士、硕士一起研究石墨烯，已在《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7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目前已经获权 7 项。

大部分人对学术望而生畏，主要的原因在于枯燥。与火热的实践相比，学术之路注定是寂寞的。但在笃定了学术之路的“学术大牛”们眼中，做学问恰恰是妙趣横生的，在思想和科技领域的探索，会让他们发现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广袤、绚丽的世界。

“他之砒霜，我之蜜糖。”热爱，是一个“学术大牛”的力量之源。

“把铅笔芯折断，落在手上的黑色粉末中就含有石墨烯。”一说起石墨烯，有些腼腆的张哲野顿时像换了一个人，滔滔不绝、眼中闪光。石墨烯被认为是未来一代的重要新材料，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运用了石墨烯技术的电脑和手机屏幕，可以像地毯一样铺开或卷起；手机电池充满电只需两分钟。

新材料的魔力让张哲野为之着迷，5 年，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他几乎都泡在实验室。在师兄弟眼中，张哲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研狂人，他一进实验室便如同进入另一个世界，茶不思饭不想，通宵达旦成了家常便饭。“如果研究卡在一个关卡，我打水、走路、躺床上，脑子里想的都是它。”张哲野说。

“科研就像变魔术。”张哲野说，他喜欢科研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四女生任鹤坤最近在全国 200 多万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挑战杯”大学生科技学术竞赛全国特等奖。她的学术之路，因热爱而开始，因责任而走得更远。

任鹤坤的研究课题与社会治理有关，探讨的是基层信访问题，她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并没有太大的学术野心，直到一段“训斥”突如其来。

任鹤坤在与家乡的信访办前主任交流时，这位官员忽然向她埋怨：“知道为什么基层的事情难办吗？因为像你这样的大学生，完全不了解基层情况，毕业后就进入政府机关，然后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决策。”

这让任鹤坤很受伤，如果大学生给人的印象如此不切实际，那读这个书还有什么用？她心里也由此憋了一股劲儿，要通过田野调查，让理论在大地上生根散叶开花。

四年中六次参与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的任鹤坤，别出心裁地从信访干部的视角出发，从“情、法、理”三个层面探究信访制度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因此具备了开拓性意义。

### 面对孤独是学人的必答题

选择学术，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孤独，因为学人更多的时候是独行，历经了时间的沉淀和反复自我考问，才有可能在沉思中获得新知。

张哲野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是可穿戴电子产品的可弯曲柔性电池，未来的电池可以随意变换形状，这无疑是个令人兴奋的改变，这也成为张哲野对抗孤独的终极大招：“我的研究有可能去造福更多的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世界，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大三的时候，课业繁重，张哲野只能把学术留给孤独的夜晚。半夜回寝室会影响室友休息，他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整整睡了一年。“不觉得冷，也不觉得孤独。”张哲野笑着说。

使命感，让“三点一线”甚至“两点一线”的科研生活变得不再那么枯燥，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绪波动，成果出得慢、研究遇到瓶颈。每当浮躁来袭，张哲野会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看看他熟悉的离心机、光化学反应仪、手套箱、瓶瓶罐罐……这些日日夜夜伴着他的仪器，总会让他的心静下来。

张哲野的导师王帅对他颇为赞赏，最得意的还是这个学生坐得住：“搞科研的学生很多，但最后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较少，这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免不了遇到坎坷、瓶颈，能够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来。”

任鹤坤却是因为孤独而爱上了学术。学社会学的她，在大一、大二的每一个假期，都跟着系里的教授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曾到过陕西、甘肃、宁夏、河北等多个省份，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做田野调查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

记录本和录音笔这对“田野调查好兄弟”，是任鹤坤最好的伙伴。“它都快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了。”任鹤坤把录音笔展示给记者，由于长期使用，按键上的漆全被磨掉了。记录本则像是任鹤坤的一本“侦探笔记”：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被调查对象的衣着、神态、动作、说话的语调等细节，以及被调查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的笔记赋予我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能够洞察问题的本质。”

“人类学教授做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原始部落，吃住都和土著人一起，没有人和他进行正常意义上的交流，这样的状态少则一年、多则数年，这种孤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任鹤坤说，与没有人交流的孤独相比，这些人文学者的孤独，更多的是一种哲学上的意味。

任鹤坤喜欢这种孤独：“这恰恰是一种丰沛的精神状态，他们可以与自己对话，与古人对话，与这个世界对话，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更加浩渺的世界。”这样的发现让任鹤坤对学术产生了无限神往：“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想拥有这样的世界。”

从理解到接受，最终享受，在享受中触摸真理，真正的学人面对孤独这道考题，总会给出完美的答卷。正如歌德所说，“灵感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

孤独，赠学术以灵感。

欲成大师，先当工匠

任鹤坤刚开始自己的调研时，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研究对象是信访干部，她就找到了一个去地方信访办实习的机会，“大多时候我就像透明人一样默默坐在旁边听、做记录，偶尔给他们倒点水。”她和信访干部们一起吃饭、午休、打牌、拉家常……日常而琐碎的生活，让她有些发狂。

“当初可是怀着阅尽苍生、针砭时弊的雄心壮志来的，但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常中，激情慢慢消散了。”好多次，她都打算放弃了，甚至认为，“这样根本写不出有意义的成果。”

但事后想想，正是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刷新了她对信访工作和信访干部的认识，不论是从感性还是理性角度看。这对论文素材的积累，至关重要。由此任鹤坤也有了一番心得：“想当大师，先从做工匠开始。只有一丝不苟地去打磨、去积累，才能在量变中引发质变，在学术领域有所开拓。”

这也正如武汉大学经济系谢丹阳教授经常跟他的学生说的：“做学术，首先要踏实肯干，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没有平日的积累，纵然有最好的命运降临，你也只能手足无措地眼望它擦肩而过。”

任鹤坤对工匠精神的理解，除了日积月累还有精益求精。

论文交稿前3天，任鹤坤偶然间读到一篇文章，一下子惊呆了：“它写得太好了，把我想写的全都写了！”她马上把文章发给了导师，导师回了她一句话：“那你还写什么？”这

让她几近崩溃：“这意味着，文章要全盘打翻，重新来过。我不想糊弄、对付，从我这里出的论文，绝不能是人云亦云的‘学术垃圾’。”

好在积累足够丰富——任鹤坤已事先整理好了十几万字的田野录音稿，再加上大量的文献整理和厚厚一沓田野日记，使她重新厘定了方向。“说来也奇怪，之后的几天，只写论文，不吃不睡也不觉得累，写到有趣的地方，心里还怦怦跳！”

成稿后，则是“强迫症”一般的十几次打磨修改。任鹤坤说，“一旦进入强迫症模式，我就根本停不下来！”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使她把论文写成了精品。

“我钦佩的‘大师’，他身上强烈的知识分子气质，这种气质是在漫长的学问之路上，慢慢在身上生长的，它是跟着你一辈子的东西。学术，是生活最好的礼物。”任鹤坤说。

（《人民日报》，2016年07月12日，第19版。）

## ※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宜早不宜迟 ※

在国家层面加强对中小学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落实，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如此，广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乃至人生规划时，才能少一份盲目，多一份从容。

清华北大两名学生退学后重考再上北大的新闻，最近颇受舆论关注。据媒体报道，这两名学生当初之所以选择退学重新踏入高考考场，均是因为对之前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如今，他们再次凭借高分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新的专业。

故事听起来有几分传奇色彩，不过终究只是个案。毕竟，从大学退学重新参加高考代价太大，更何况最终能否如愿考入心仪的大学和专业，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位“学霸”的选择没有多少参考价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大学后发现专业难合口味的学生，事实上并非少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超六成受访者承认，自己在报考专业时是“盲目的”；超7成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针对大学生“学非所愿”问题，不少人建议应该建立灵活完善的高校转专业制度，给予大学生更多选择权，这固然是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但“试错”的过程无疑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如果把端口前移，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找到兴趣爱好所在，进而确定职业倾向，那么就能极大提高学生与专业的匹配度，为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不在于选择具体的职业，不是简单传达就业信息和技巧，而是要让学生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个性特点、兴趣能力所在，并学会把自身优势转变成职业兴趣和人生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关系个人一生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国内基础教育阶段，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却面临不小尴尬。尽管不少中小学已经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但起步晚、师资匮乏、内容设置不合理等都是目前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甚至仍处于空白。这或许与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学校和家长功利的教育理念不无关系。在很多人看来，比起孩子的性格禀赋、兴趣爱好、实践能力，孩子能否考高分、上名牌大学才是最要紧的，一切都要为之让路。因此，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如何更好地在基础教育阶段落地，是摆在教育管理部门、学校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属于强制性的教育内容，政府出台了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予以保障，比如美国早在 1989 年就颁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明确规定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要从 6 岁开始，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家级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发布指导方针，定期进行监督考核；具体内容也涵盖广泛，课程学习和实践体验活动相结合，并针对不同年龄特点进行分层教学。此外，很多学校都与大学展开合作，在高中阶段开设大学先修课程，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学专业信息，提前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国外这些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理念和做法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

如今，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正成为国家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方向，“一考定终身”的局面也将随之改变，学生在报考科目、升学通道、对自己考试成绩的使用等方面有了更多选择。因此，能否充分根据自身兴趣特长，科学选择考试科目和专业尤为关键，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就是“落实学生选择权”的必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家层面加强对中小学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规划与落实，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如此，广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乃至人生规划时，才能少一份盲目，多一份从容。（《中国教育报》，2016 年 07 月 05 日，第 2 版。）

## ※ “双一流” 需要一流管理 ※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双一流”建设，广受高等教育界关注。舆论普遍关注，高校如何建设一流师资，开展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学科，开展一流学术研究，产出一流成果。这些是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应有之义。而在笔者看来，要实现这些一流，一流管理至关重要。

高校的一流管理，首先要有一流的校长，这不是要求校长有多高的学术头衔，而是要求校长：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全心做职业化、专业化的校长。要把这样的人遴选到校长岗位，就需要推行校长公选。教育部已启动公选校长试点，对公选的校长明确要求任职后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接下来，公选校长的改革步伐将加大。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校长 20 年时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仅仅出版了一本专著——《大学工作》，他说，“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两个：找人才，找钱”。要说校长的“国际范”，这就是“国际范”，不是在位期间把自己打造为学术大师，而是把学校打造为一流学府。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校长自身的自觉，另一方面则需要明确校长职责，要求校长必须“利益回避”。

其次要有一流的行政人员与机构，近年来，大学克服行政化倾向，是高校改革的重要议题。克服行政化倾向，不是说大学不要行政，而是要求行政回归本位，做行政该做的事，为师生提供高效的服务，如梅贻琦所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那行政人员更不必说了。这就要求精简行政队伍，明确行政部门的职权，不能用行政权去干涉教育权、学术权。

更重要的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以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为原则，构建学校新的管理结构。“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到，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那么，高校如何制订具体“双一流”建设方案？是由大学行政职能部门制订？还是在制订方案时，广泛听取各学科教师、学生的意见，把教育发展战略的制订，交给教授委员会，把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规划的制订，交给学术委员会？这就检验学校是否在推进现代治理，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可以说，制订方案的程序、机制，决定双“一流”建设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质突破与建设成效。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需要实际作为，不能重要的教育和学术事务，仍旧由行政说了算。教育部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要求高校重视本科教育，规定高校要把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但迄今为止，我国“双一流”建设学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的问题，在教师眼里，课题、经费、论文的重要性，远高于给学生上课的重要性。这和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制订的考核、评价、晋升教师的标准有密切关系。相当数量的学校，就采用简单的数量指标考核、管理、评价教师，这种管理、评价方式必须改革。而从重视规模、数量发展，到重视内涵、质量提升，已是教育规划纲要给高等教育提出的新任务。

或有高校会认为：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还在建设、完善中，把“双一流”建设这么重要的方案，交给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决策，步子迈得有点大。这需要转变思路，把方案制订的过程，就作为完善学校现代治理结构的过程。假如在方案中，高校提到要依照《高等教育法》，把学术委员会建成学校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可是，却在制订方案时，不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这能让教授们相信学校真有改革的决心吗？早在高校制订大学章程时，笔者就曾建议，高校应该把大学章程制订的过程，作为按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梳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内部治理改革的过程，如果高校这样做，也就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为创建“双一流”提供制度保障与动力。

建设“双一流”，当务之急，不是制订建设的时间表，不是给师生分解、下达一流建设的指标、任务，而是构建一流管理体系，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激发所有师生教育与学术梦想。（《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07期。作者：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主 编：闫月勤

责任编辑：李京肽 张 爽 郭海霞

办公室地址：犀浦校区综合办公楼 408 室      联系电话：66367103 66367042

电子邮箱：skb@swjtu.edu.cn